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基因

郝书翠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不竭动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茎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深刻理解“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理念和主张,同样需要到中华文化基因中去溯源。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持续演进,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亟需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传承和发扬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崇尚和平合作的中华文化基因,能更好为人类应对文明隔阂,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和合共生,贡献中国智慧。

植根于尚和合的思想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中华文化尚和合、求大同,“和”的价值理念熔铸为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尚和合的思想理念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体现了中国人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决定了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和海纳百川的情怀与其他文明对话、交融,并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始终保持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向倡导“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生活经验在发展中不断升华。《中庸》将“和”视为“天下之达道”,庄子“太和万物”的理想也体现了“和”。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理念滋养下,中华民族将“和”与

“合”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等关系的基本取向,提出“君子和而不同”,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追求我与我、我与他人、我与他物和谐的理想状态。

从中华文明自身发展历程看,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在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中碰撞、融合、升华。在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进程中,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聚在了一起,文化基因汇到了一起,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了一体。

中华文明与全球其他文明的互鉴融通同样展现了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基因既尊重文明多样性,又包容文明异质性,在推动不同文明互相欣赏、和谐共处、共同进步中不断强化,赋予中华文明强大的整合力量和现代力量。中华文明因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并通过不断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而始终焕发活力。

在守正创新中历久弥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基因在守正创新中历久弥新。

先看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创造性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两个结合”揭示了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不仅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而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在更高层次、更广阔的时空中彰显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

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

——习近平主席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基因。“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再看理念革新。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大行其道,“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西方霸权将文明标准政治化和工具化,无视文明多样性,忽视人类文明交融互鉴的本质,这成为冲突与战乱의 深层诱因。当今世界,文化对抗和地缘冲突、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隔阂有增无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文明传播和发展的重要规律,提出:“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并且强调,“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在求同存异中汇集推动文明进步的最大公约数,这种坚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理念正在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在实践中迸发持久活力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内蕴着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哲学

传统,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逻辑,随着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的实践持续深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基因正在不断迸发新的动力活力。中外文化交流实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中华民族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所作的现实贡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推动不同文明在交流中融合、在互鉴中发展,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和包容;举行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中拉人权圆桌会等,促进各国共议不同文明的价值内涵,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搭建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等多层次国际平台,拓展文化对话与沟通渠道;推动联合国大会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将文明对话纳入全球机制性安排;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文明交流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互动。一系列实践始终于多样文明中寻求价值共鸣,成为实现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关键之举。

这些都充分证明,文明的多样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当今世界更好发展的动力,是孕育多元现代化道路的依托。“和合共生”的中国智慧正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具包容性和实践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普惠金融体系的整体建设周期长,却暖民心、利长远。特别是在“三农”领域,需要金融服务的有力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服务体系”,对更好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出了要求。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已实现基础服务基本全覆盖,2025年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突破53万亿元,但仍面临供需结构性失衡、运营成本高、风险防控压力大等问题。信用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是提升农村金融运行效率的重要支撑。金融机构现有信贷模式在服务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仍存在“不敢贷、不愿贷、不善贷”问题,根源在于其管理模式与“三农”领域独特的资产结构、产业风险、社会生态不匹配。以数字信用建设为突破口,通过技术赋能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助力农村普惠金融从“广覆盖”迈向“高质量”,已成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着力点。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需要长期深耕,首要的就是立足农业农村特点来提升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农村金融服务的是万千小农户、小微主体,单笔贷款金额小、风险高、回报慢。这些特点决定了农村金融服务不能简单地套用服务城市工商业的模式。

一方面,要夯实信用基础,协同推进资产价值转化与涉农信息整合。信用体系建设滞后是制约金融资源下沉的重要障碍。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抵押物不足、信用记录缺失等问题,难以满足信贷准入门槛。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因价值评估与流转机制不健全,难以转化为信用载体。涉农数据分散于多部门,金融机构获取真实、动态的信用信息成本高、验证难,需构建统一规范的涉农信用信息平台。

另一方面,需把握产业特质,创新适配农业风险的风控模式和成本分担机制。农业具有自然依赖性和市场亦有不波动性,基于财务数据和抵押担保的风控模型难以准确识别这方面的风险,导致涉农贷款不良率承压。加之农村金融需求小额、分散、高频,单笔业务成本较高,影响商业可持续性。破解之道在于发展适配农业周期的风控技术,将遥感监测、农业保险数据、产业链信息等纳入风险识别体系;健全“政银保担”多方联动的风险分担机制,推动普惠性与商业可持续性有机统一。

此外,还需适应乡村社会变化,推动金融服务的场景化与差异化创新。随着乡村产业向规模化、融合化升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已从生产经营周转资金需求拓展至中长期投资、产业链整合等领域。当前农村金融产品仍以短期、同质化的流动资金贷款为主,与中长期、个性化需求尚不匹配。金融机构需深耕农业生产、农资流通等场景,开发与项目周期相匹配的信贷产品,推动金融供给从“粗放覆盖”向“精准适配”转变。

信用评估是金融机构贷款授信的核心环节,信用不足是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决定性因素。目前金融机构开展农村普惠金融面临三重困境:不敢贷,缺乏可靠信用支撑;不愿贷,服务成本高、收益低,商业上难以持续;不善贷,信贷产品难匹配,服务能力不足。推动数字信用建设有助于针对性解决问题。探索数字信用并非创造新信用,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遥感等技术,深度融合生产经营、生活消费与乡村治理等多元数据,对农村经营主体多维度的信用信息进行深度挖掘与综合评估,构建动态、立体、全景式的信用画像,为化解农村金融服务深层次矛盾提供关键抓手。

以数据融合化解风险隐患,筑牢“敢贷”的基础。解决金融机构“不敢贷”的问题,关键在于为风险判断提供充分、可靠且低成本的数据依据。在数据层面,可依托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加快建设县级涉农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有效打破数据壁垒。在技术层面,可积极运用卫星遥感、物联网等科技手段,对农作物长势、种植面积等进行动态监测,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数据化与可核验。在应用层面,可大力推广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活体畜禽、农业设施等抵押的创新模式,将农村特有的资源禀赋转化为金融机构认可的信用资产。同时,落实贷款尽职免责机制,激发金融机构“敢贷”积极性。

以智能信贷提升成本收益,激发“愿贷”的动力。破解金融机构“不愿贷”的困境,关键在于大幅降低农村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与运营风险。可将多维信用数据构建的智能风控与自动化审批模型,前置贷前调查、授信审批与贷后风险监控为一体,大幅降低单笔业务的运营成本和人工依赖。沿着农业产业链供应链衍生出的链式金融服务,还能够依托核心企业平台或数字平台,将信贷服务无缝嵌入从农资采购到产品销售的全流程,实现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的闭环管理与风险控制。这种模式下,服务成本能够显著下降,使农村金融服务从依靠政策驱动逐步转向具有可持续性的商业驱动,增强金融机构“愿贷”动力。

以场景化创新精准服务,实现“善贷”的价值。在“能贷”的基础上实现“善贷”,要求金融服务从标准化产品供给,转向基于深度洞察的精准匹配与主动创设。借助数字信用体系对农业产业周期、经营主体特征与具体场景的精准刻画,金融机构能够开发出高度差异化、场景化的金融产品。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设施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文旅等特定领域,可创新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贷”等产品。利用数字渠道开展金融知识普及,设计便农的简易操作界面,能够更好地使金融资源公平、有效地惠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和产业链各环节。

(作者系广东金融学院信用管理学院副院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本版编辑 梁笑语 美 编 高 妍
来稿邮箱 jjrbl@sina.com

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程曼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的目标,“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科技等硬实力,而且包括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国民素养等软实力。在软实力中,我国更加强调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文化软实力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了深层支撑,亦将在“十五五”时期以及更远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彰显重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也日趋激烈,文化软实力在凝聚民族精神、引领社会风尚、塑造国家形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看,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在外交事

务中的影响力,涵盖文化生产力、文化竞争力和文化传播力等诸多方面。“十四五”时期,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中国特伟大国外交全面拓展,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了强大正能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理解与认同,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错误论调不时沉渣泛起,我国面临的国际话语权和中华文化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道远。理论和实践都已说明,文化的力量可以跨越国界、直抵人心,这也要求我们增强以文化与世界对话的理念,依靠文化文明的力量形塑世界对中国的正确认知,使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硬实力相匹配。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需进一步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特别是要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以此牵引和推动国家软实力的整体提高。

虽然我国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还不够匹配,但我们已经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一方面,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从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到织密民族互

助交融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都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影响力持续彰显。“悟空”和“哪吒”风靡全球,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在海外持续“圈粉”,“Becoming Chinese”(成为中国人)走红社交平台……同时,我国有序推进自主开放、单边开放、稳步扩大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5年入境外国人8203.5万人次,同比上升26.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3008万人次,同比增长49.5%。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从“中国游”到“中国购”,中国以开放姿态和优质供给成为全球游客青睐的目的地。

下一步,需在夯实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一是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积极创新对外传播工作思路,在组织规划、制度安排和理论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探索建立系统集成的对外传播机制,健全从国家层面对“大外宣”进行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协同实施、合力推进的管理体制。建议根据国家传播战略的整体目标和阶段性要求对国际传播体系进行规划和调整,在传媒产业布局、新媒体技术运用、民族品牌形成、核心价值观建设、对外形象建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以及传播方案、主题、产品、渠道等方面,统筹推进。

二是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目前,中央和地方各类媒体协同参与的外宣工作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主流媒体不断探索信息传播的新方法、新模式,逐步从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变。面对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主流媒体仍需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既要建立符合人类社会发

